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丙种译丛·第壹号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主编

# 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 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

[美] 戚安道 著 毕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丙种译丛·第壹号  
南 京 大 学 六 朝 研 究 所 主 编



# 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 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

[美] 戚安道著 毕云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 /  
(美)戚安道著；毕云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1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丙种译丛·第壹号)

书名原文：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China: The Xiangyang Garrison, 400 - 600 CE.

ISBN 978 - 7 - 305 - 23751 - 5

I. ①中… II. ①戚… ②毕… III. ①政治制度—研  
究—中国—400 - 600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7379号

**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China: The Xiangyang Garrison, 400 - 600 CE**  
By Andrew Chittick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010, and may be only sold in Mainland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18 - 2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丙种译丛·第壹号

书 名 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

著 者 [美]戚安道

译 者 毕 云

责任编辑 王 静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20 印张12 字数200千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23751 - 5

定 价 60.00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总序

晃晃悠悠的节奏、断断续续的过程，也许是“万事开头难”吧，从2017年3月14日“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成立仪式暨学术座谈会”召开、计划出版系列图书至今，竟然已经三年又八个月过去了，具有“标志”意义的南京大学出版社版“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首批四册，终于即将推出，它们是：

刘淑芬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增订本)，“甲种专著”第叁号；

张学锋编《“都城圈”与“都城圈社会”研究文集——以六朝建康为中心》，“乙种论集”第壹号；

[美]戚安道(Andrew Chittick)著、毕云译《中古中国的荫护与社群：公元400—600年的襄阳城》，“丙种译丛”第壹号；

[德]安然(Annette Kieser)著、周胤等译《从文物考古透视六朝社会》，“丙种译丛”第贰号。

既然是“首批四册”，如何“甲种专著”却编为“第叁号”呢？这缘于此前“书系”已经出版了以下数种：

胡阿祥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修订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甲种专著”第壹号；

吴桂兵著《中古丧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甲种专著”第贰号；

(唐)许嵩撰，张学锋、陆帅整理《建康实录》，南京出版社，2019年10

月版，“丁种资料”第壹号；

胡阿祥著《“胡”说六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戊种公共史学”第壹号；

胡阿祥、王景福著《谢朓传》，凤凰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戊种公共史学”第贰号。

据上所陈，“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的总体设计，应该就可以瞭然了。

首先，“书系”包含五个系列，即甲种专著、乙种论集、丙种译丛、丁种资料、戊种公共史学，这显示了我们对于六朝历史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全面关注、对话学界之“学院”史学与面向社会之“公共史学”的兼容并包。

其次，“书系”出版采取“1+N”模式，“1”为南京大学出版社，“N”为其他出版社，“1”为主，“N”为辅，但仍按出版时序进行统一编号。所以如此处理，自然不在追求“差异美”，而是随顺作者、译者、编者的意愿以及其他各别复杂情形。

再次，“书系”虽以“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冠名，但只是冠名而已，我们会热忱邀约、真诚接受所内外、校内外、国内外的书稿，并尽遴选、评审、建议乃至修改之责。

要之，五个系列的齐头并进、出版单位的灵活安排、书稿来源的不拘内外，这样有异寻常的总体设计，又都服务于我们的相关中期乃至远期目标：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学界同仁共襄盛举的“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渐具规模、形成特色、产生影响，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也因之成为学界同仁信任、首肯乃至赞誉的研究机构。如此，庶不辜负我们回望的如梦的六朝时代、我们生活的坚韧而光荣的华夏正统古都南京、我们工作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南京大学、我们钟情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 二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有着厚实的六朝研究传统。蒋赞初、孟昭庚等老一辈学者宏基初奠，如蒋赞初教授开创的六朝考古领域，在学界独树一帜，若孟昭庚教授从事的六朝文献整理，在学界备受赞誉；近20多年来，张学锋、贺云翱、吴桂兵、杨晓春等中年学者开拓创新，又形成了六朝人文地理、东亚关系、都城考古、墓葬考古、佛教考古等特色方向。推而广之，南京大学文学院程章灿之石刻文献研究、赵益之知识信仰研究、童岭之思想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地海学院陈刚之建康空间研究，皆已卓然成家；又卞孝萱师创办的“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已历半个多甲子，一批“后浪”张罗的“六朝历史与考古青年学者交流会”，近期将举办第七回，本人任馆长的六朝博物馆，成为六朝古都南京的璀璨“地标”，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晓庄学院等，也都汇聚起不弱的六朝研究力量。凡此种种，既有意或无意中彰显了学者个人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义理”追求，也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了现实社会对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等的“经济”（经世济用）需求。

即以现实社会之“经济”需求而言，就南方论，就江苏论，就南京论，六朝时代既是整体变迁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环，又是特别关键、相当荣耀的一环。以秦岭-淮河为大致分界的中国南方，经过六朝时代，经济开发出来了，文化发展起来了；跨江越淮带海的江苏，唤醒历史记忆，弘扬文化遗产，同样无法绕过六朝时代；而南京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四大古都、中国南方第一的古都，也主要是因为六朝在此建都。

六朝的意义当然绝不仅此。举其“义理”之荦荦大者，以言孙吴，经过孙吴一朝的民族融合、交通开辟、政区设置，南中国进入了中国历史的主舞台，并引领了此后北方有乱、避难南方的历史趋势，比如东晋、南朝、南宋皆如此；以言东晋南朝，当中国北方陷入十六国大乱，正是晋朝在南方的重建以及其后宋、齐、梁、陈较为平稳的递嬗，才使传统华夏文

明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发展并丰富，这样薪火相传、“凤凰涅槃”的南方华夏文明，又给北方的十六国北朝之“汉化”或“本土化”的演进，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完整的“模范”，其结果，便是南与北交融、胡与汉融铸而成的辉煌灿烂的隋唐文明，特别是其中的精英文化；再言虽然分隔为孙吴、东晋南朝两段而诸多方面仍一以贯之的六朝，就颇有学者把包括六朝在内的汉晋文化与罗马文化并列为世界古代文明的两大中心，这又无疑显示了六朝文化在世界史上的超凡地位。

然则围绕着这样的“义理”与“经济”，笔者起2004年、至2018年，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专栏写下了50篇回旋往复甚至有些啰嗦的“主持人语”，这些“主持人语”，现已结集在“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最先问世的《“胡”说六朝》中；至于“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书系”过去近四年的“万事开头难”、今后若干年的“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我们也就自我定位为伟哉斯业，准备着无怨无悔地奉献心力了……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 所长胡阿祥

2020年11月16日

## 致谢词

我最早关于襄阳地区历史文献材料的研究受惠于我在密歇根大学时的导师们,包括张春树(Chang Chun-shu)教授、杜志豪(Ken DeWoskin)教授、雷·范·丹(Ray Van Dam)教授等。尤其感谢 Van Dam 教授在罗马帝国史研究(尤其在护民官问题上)和我所感兴趣的早期中国史研究外界视角等问题上给我提供的帮助,这激发了我后来思考许多问题,并为我的后续研究指明了不少通幽曲径。近年来我的研究极大地得益于我在中国中古早期研究会(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的同侪们所给予之无价支持、鼓励和建议,当中尤以南恺时(Keith Knapp)、裴士凯(Scott Pearce)与丁爱博(Albert Dien)为最。我在东南早期中国圆桌会议(Southeast Early China Roundtable)的同事们也作为可贵的参谋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研究灵感;我对他们在过去十年内所提供的智力和社交上所提供的友谊与陪伴深表感激。我也非常感谢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uncil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为我于 1995—1996 年在湖北的调研提供的财力支持,还有埃克德学院(Eckerd College)提供的教员发展基金、六年一次的年假以及近期的一次为完成本书稿而批准的半学术研究休假。我非常感激以南茜·艾勒格特(Nancy Ellegate)女士为首的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UNY Press)的工作人员,她们令人愉快而又高效的工作加速推进了本书的问世。最后,我必须鸣谢茹丝·佩蒂斯(Ruth Pettis)女士的欣悦友谊和她为本书绘制的漂亮地图和封面设

计,后者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襄阳地区的墓葬画。尽管我得到了各方助力,但本书中无疑还是会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那些当然是我自己的责任。

(译自英文原版致谢词,2009年)

## 翻译说明

本书作者引入“patronage”的概念作为诠释南朝历史的切入点——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发明，比如伊佩霞(Patricia Ebrey)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撰文讨论过东汉时期的荫护关系——这也是本书翻译中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因为汉语中并没有与之含义完全匹配的现成词汇。翻译工作准备阶段，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个词上，自己思考，与人讨论，反复推敲，历月余方才动笔。

按照作者的阐释，“patronage”是发生在“patron”和“client”之间的荫庇关系。在现代语汇中，“patron”一般是指出资者和赞助人，本书第四章有关佛寺建造的部分就不怎么涉及人事关系，而以经济上的资助为主，因此这一部分中出现的“patronage”就直接翻译成“赞助/资助”。但这样的翻译在描述文中的那些人事关系时显然是不准确的。作者在英文版致谢词中提到，本书中“patronage”概念的引入是受到古罗马时代“护民官”的启发，因此译文中选择将“patron”译作“护主”，而“client”则翻译成“荫客”（当然，这不是两晋户令中的“荫客制”，主客双方之间除了上级和下属的关系以外，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任何制度化的身份依附关系；其实，如果允许我们用当下流行的俗语来描述的话，“抱大腿”一词颇得其神髓）；护主和荫客之间，自上而下的“patronage”即为“荫护”或“荫庇”，自下而上的“clientage”则为“托庇”。实际上，书中大多数被称为“荫客”的人其实只是得到其护主（多为藩王或一方权贵）赏识重用的下属，因而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得到后者的支持提携（而这种提携有时也缺乏直接证明，而只是其中有一些荫客会随护主之进位称帝而升官）。

在作者看来，荫护机制更侧重于荫客而不是护主，正如终章“结论”部分开头所说的那样，本书是“以地方州郡寒门视角纵观南朝历史”。但实际上，行文中赖以脉络的还是那些护主们的人生轨迹。而在译者看来，本书对于理解南朝历史最大的贡献在于对以襄阳地区为首之“西土”的关注——建康和三吴地区从来备受瞩目，而我们对于“西土”的了解很少（甚至会忽视此种了解的重要性），尤其缺乏这种系统性研究。

本书中还使用了“community”一词。虽然“共同体”是较为流行的译法，但是作者已经在论述中为我们指出，襄阳地区尽管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习俗，但基本没有什么认同和凝聚力，这与我们习惯认知和一般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并不匹配，因此译文中直接将“community”译作“社群”，以突显地缘纽带关系。

英文原著采用尾注，每章节重新编号；译文考虑到中文习惯和阅读便利，改为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

为尽量呈现原著面貌，译文中的所有页下注均为原著所有；翻译过程中必要的补充说明和勘误则加“译者按”，以小字加括号的形式穿插在正文中。

页下注中所引文献版本均与原著保持统一，遇新版本——诸如有新校本的古籍（如《南齐书》新校本）、日文原版或中译本的英译著作（如由 Joshua Fogel 翻译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英译本，中文学术界一般用不到此版本，而是参考中译本或日文原版）——并不擅自改引，以便如实体现作者的文献来源。

注释中的外文文献原则上保持原貌，只略作调整以统一格式。但对于外文文献的责任人，根据中文图书出版惯例，如果是有正式汉名的西方汉学家，或以假名拼音作为英文著作责任人的日本学者，则尽量在首次出现时以汉字形式呈现，并加注国籍，以括号备注原文，如“[美] Patricia Ebrey(伊佩霞)”“[日] Tanigawa Michio(谷川道雄)”等，以便读者熟悉；再次出现时，则遵英文注释习惯简写，如“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或“*Tanigawa, Medieval Socie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等。对于正文或注释中提到、但没有正式汉名的外文人名,不再像致谢词中那样以汉字拟音——例如“雷·范·丹(Ray Van Dam)”或“茹丝·佩蒂斯(Ruth Pettis)”——以免混乱和赘余;读者如需查询相关信息,仍请按原名索引。

中英文表述上的习惯差异是翻译工作中的亘古难题——完全直译的话,可读性必然大打折扣,文字所可能呈现的任何美好都会在从句套从句的生硬中丢失;太过于意译又容易掩盖海外汉学的原来面貌,甚至会在无意中改变原文的论述和逻辑架构。如何取得平衡是关键,我自问尚未游刃有余。在翻译过程中,通常对原文理解无碍,但翻译时却不知不觉把自己绕进去,造成谬误,有一些能即时发现并加以修改,还有一些却因为思维疲劳而没看出来——这里必须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王静编辑的细致工作,为我指出许多容易造成歧义甚至错误的地方,译文才能显得较为得体。最后借用原著致谢词中那句话,尽管得到不少帮助,但译文中“无疑还是会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那些当然是我自己的责任”。

毕云

二〇二〇年八月于南京九龙湖

# 目 录

总 序	1
致谢词	1
翻译说明	1
<b>第一章 导 论</b>	<b>1</b>
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	2
社群与认同	4
作为政治社会体制的荫护关系	11
政权更迭及其他术语命名	17
襄阳地区简介	19
<b>第二章 发展(400—465)</b>	<b>26</b>
刘裕新政:侨寓与土断	27
刘裕新政:行政重组	32
宗王与荫护:柳元景的早期政治生涯	35
征伐中的襄阳人(442—454)	39
襄阳在地文化:荣誉、复仇与暴力	48
襄阳在地文化:音乐和舞蹈	53
地方社会的力量展示:刘骏政权下的襄阳	58

小结:权力的风险 .....	67
<b>第三章 碎裂(465—500)</b> .....	69
公元465—466年内战时期的襄阳人 .....	70
朝廷与襄阳城之间关系结构的演化(466—483) .....	75
士绅化与侨寓 .....	82
侨民聚落 .....	89
具备更广阔关系纽带的侨民集团 .....	100
南齐王朝的危机 .....	104
小 结 .....	111
<b>第四章 巅峰(500—530)</b> .....	113
萧衍集结“襄阳派系” .....	114
“江陵派系”与建康政变 .....	120
在京师的襄阳人 .....	126
襄阳本土的学问:以鲍至为例 .....	134
襄阳的图像学:来自当地墓葬的证据 .....	143
对朝堂佛教的赞助 .....	147
针对在地文化的皇室偏见 .....	151
竞争性的表演:本地的军事节庆文化 .....	156
小 结 .....	163
<b>第五章 升华(530—600)</b> .....	164
好斗的群体和自由浮动的忠诚 .....	165

宇文氏统治下的襄阳 .....	176
复仇与家庭纽带 .....	182
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	186
小 结 .....	190
<b>第六章 结 论</b> .....	<b>191</b>
在地社群与在地文化 .....	191
荫护关系与朝廷—地方关系的演化 .....	198
<b>附录:家族谱系</b> .....	<b>203</b>
图表 1 柳卓的部分后代 .....	204
图表 2 韦华的部分后代 .....	205
图表 3 部分南阳聚落成员之间的关系 .....	206
<b>参考文献</b> .....	<b>207</b>

# 第一章 导 论

## INTRODUCTION

本研究企图阐释在公元五六世纪中国一个重要的地方社会，即襄阳地区（今湖北北部）的发展，以及其社会成员与南方建康朝廷所遣代表之间的互动关系。该研究照应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早期中古中国社会制度研究当中的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译者按：美国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称中国中古政治为寡头政治（Oligarchy）〕研究模式的短处，通过演示论证提出，对于理解当时政治体制的巨大不稳定性以及地方领袖的征聘和同化过程而言，一个以“荫护”（patronage）为基础的研究模式能够提供更大的帮助。本研究的中心论点是，荫护模式是理解南朝综合政治组织形式的最有效的研究途径。

进一步而言，本研究试图理解荫护系统对于当地社会及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此前的相关研究尝试将地方社会定性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社群，在这样一个社群中，当地精英发展出了一种兼具保护性和抚育性的特质；而对于这样一个社群，当地人有着强烈的忠诚感和认同感。而经本研究检验证明，这个构想是有不足的，反而有证据显示，当地社会是极其割裂的，人们各自向狭义的家族纽带或社会次群组效忠。这种割裂性因荫护而得以维系甚至加重，因为荫护关系持续地将人们的忠诚从其所属社群中抽离，并重新注入帝国守护官身上；它同时也将帝国朝堂上激烈的继位争夺投射到当地事务上。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割裂性，襄阳地区的文化仍然具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其得以与建康的文化迥异，虽然后者常常被笼统视作“南方”的代表。这些特质包括在职业及个人生活中对于暴力的惯常使用，复

仇与个人荣誉的重要性，社会领袖层所受经典教育甚至基础文学教育的缺乏，以及基于歌、舞和音乐伴奏的口头文化。这一区域文化缺乏正式的文学表达，也不是抽象、客观的认同和忠诚的基础。然而，它影响了当地人和建康精英之间的相互感知，而后者来自一个十分不一样的文化环境。通过描绘这样一种地方性文化类型，本研究企图挑战对于“南方”文化的流行观念，而这样一种概念的形成过分地根基于建康士人的相关书写及他们的文化触觉。

## 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

### ARISTOCRACY AND OLIGARCHY

实践证明，早期中古中国社会很难被概括<sup>①</sup>。这一历史时期被形容为“贵族制的”，但关于如何定义这种“贵族政治”，学界有着很大的讨论，甚至质疑这样一种“贵族政治”是否真的曾经存在。在这个讨论范围的一端，学者们将出任官职和国家授予的身份地位视作统治阶级的标记；“寡头政治”一词同样被应用到该构想当中，尤其是对于唐代精英阶层而言<sup>②</sup>。但是东晋(317—420)和南朝(420—589)的相关证据却显示出，只有极少数的家族能够维持数代都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政治权力；而这样急速的权力更迭实际上并不能支撑“寡头政治”所暗示的

---

① 关于尝试归纳中古社会秩序特征的小结，参见[美]Albert Dien(丁爱博)主编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的导论部分，第1—29页。

② [美]Patricia Ebrey(伊佩霞),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美]David Johnson(姜士彬),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Boulder: Westview, 1976); [日]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论》，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9—391页。